

良渚考古是百年甚至千年的工作

——专访考古学家孙庆伟

■ 本报记者 马黎 王晶

良渚,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见证。在前几天举行的第三届“良渚论坛”主论坛上,考古学家、西北大学校长孙庆伟做了主旨演讲。孙庆伟说,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,关键的一条就是关于重塑文明的定义,建立判定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标准。

正是基于以良渚古城为代表的考古发现,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以“文字、冶金术和城市”作为早期文明三要素标准的束缚,创新提出了以“城市、阶级、国家”作为判断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。

在活动间隙,我们专访了孙庆伟。他提到,1977年,也是在这个时节的杭州,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来到良渚,坐在大观山果园的草坪上,和严文明先生的那场聊天:“古代的杭州,就在这里。”

我们的对话便从他的这段联想展开……

记者:您来过良渚很多次,对良渚的考古研究很熟悉,您怎么看良渚考古工作这些年的发展?

孙庆伟:良渚考古首先是确立了一个全国考古的标杆。大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核心工作,也是研究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关键节点。

从牟永抗、王明达先生,到刘斌、方向明、王宁远、陈明辉等几代浙江考古学者,锲而不舍地坚守在良渚文化考古一线,才取得了今天这瞩目的成绩。如果没有这些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,这些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都无从谈起。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人手不多,光是配合基建的任务就很重,但是他们能够把学术研究和主动性发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,集中优势兵力,持之以恒在良渚遗址开展工作。我想这对全国的考古同行都是很重要的启示。

记者:良渚的标杆意义,还体现在什么地方?



孙庆伟:考古学家,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,西北大学校长。

孙庆伟:还体现在良渚这种超大型遗址工作本身。像殷墟遗址考古,已经进行了近100年。良渚考古,我想同样是百年,甚至是千年的工作。

但是人生有限,怎么样在比较短的时间内,比较高效地厘清良渚遗址的基本面貌,并且抓住它的关键核心,这对考古工作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。在这方面,浙江的考古工作者以祭坛、城址和水坝的发现和发掘为突破口,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如此丰硕的成果,这也是让我们非常敬佩的。此外,良渚还给全国乃至世界考古和遗产保护同行带来启发,它也是遗产保护利用的典范。

而在文明的阐释方面,良渚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通过良渚的考古发现,中国学者提出了文明定义的中国方案。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,对于文明的理解究竟是什么?对于文明这个词的理解,它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,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,它关系到我们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理解和弘扬,关系到我们的文化自信。

最后一点,现在正在日益显现的是,良渚的保护研究和阐释,已经到了一个有效的、合理利用的新阶段。

记者:除了史前考古,您怎么看浙江考古这些年的发展?

孙庆伟:首先,考古工作的氛围好。主管部门重视、专业部门努力、具体承担工作的同志很敬业,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氛围,这对于干事创业特别重要。现在很多省的考古同行都对此



良渚文化玉璧。

良渚遗址管委会供图

很羡慕,包括很多年轻人愿意来浙江工作。当良好的工作氛围形成后,成果自然会涌现出来。

从考古的资源禀赋来讲,浙江考古不是最优的,很难和河南、陕西这些省份去比。但是,现在考古学正处在一个转型阶段,就是从发掘到阐释这样一个转变阶段。在这个阶段中,浙江考古的引领优势已经开始显现。这个契机,就是良渚考古,目前它已经走在全国前列,成果也显现出来了。

以良渚考古为龙头,形成很好的工作范式,再推广,我想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。下一步,是否还可以在转化方面再引领全国考古界?

未来的考古学绝对不是以挖为主,以前傅斯年先生说要“动手动脚找东西”,现在就是要动脑动嘴讲故事,讲好文明的故事,这应该是新时代考古的重要使命。

记者:怎么理解这种转化?您刚才提到从发掘到阐释的转变,能否具体讲讲阐释。

孙庆伟: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转化,就是实现学术话语的大众化表达。苏秉琦先生做了很好的示范。他晚年时写了《中

国文明起源新探》,这是一部真正有跨学科影响力的作品,在社会上影响很大。

如何转化?有两个要素很重要。第一个,就像苏秉琦先生说的,考古是人民的事业。也就是说,考古工作一定不能脱离人民。只有把工作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,才有了源头活水,而不只是囿于学术的小圈层。第二个,就是转化的方式,或者说是“活”起来的方式。我们研究历史,从孔子和司马迁开始,都不是为了过去,而是为了“述往事,思来者”,一定要有贯通古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在主论坛发言的最后,我提到,文明既是存在论的,更是生成论的。我们说良渚,既要说5000年前的良渚,更要想到现在的良渚和未来的良渚,这是文物“活”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方向。考古学者应该更多打破学科壁垒,走向人民大众,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这是当务之急。从这点来讲,我想考古工作的星辰大海还没有到来。

记者:中国古代玉器是您的重点研究方向,探索长江下游地区文明演进模式,绕不开对“玉器时代”的讨论。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标志来看,您怎么看“玉器时代”?



是很难有考古学支撑的。

关于玉器文明,我们目前找到最早的高峰就两个,一个良渚文化,一个红山文化。所以,从文明的源头上看,良渚文化有非常关键的贡献。

记者:您觉得接下来良渚考古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,或者说您有什么期待?

孙庆伟:我认为最主要的,要从看物、懂物,到看人。比如,我认为良渚古城绝对是一个智慧城市。它依托地形、水文、生态,因势利导,构建起山、水、城、田、湖五位一体的大型复杂城市系统。

从分区上看,古城初步形成了宫殿、仓储、手工业作坊、贵族墓葬等功能分区,以及内城、外郭等城市圈层格局。从公共设施看,良渚古城遗址群周边用草裹泥技术堆砌成大型水坝群,使城内的河道与外围水系相贯通,形成了农业灌溉、养殖、生态围育的生态循环,还有高效密集的水上交通运输网,甚至具备有效调节水量的洪涝风控体系,当之无愧成为古代文明“智慧营城”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“中华第一城”。

这中间一定是有设计理念的,否则莫角山宫殿区怎么会方方正正居于中间?这当然是设计的。5000年前的良渚,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个“大国工匠”是谁,但他一定有宏大的设计理念。

考古首先是大视野,再是小器物。如果我们一下子陷入到了了一个具体的器物、一条具体的城壕、一个具体的墓葬里面,那就失去了整体观。我们现在研究的是文明的最高形态,所以一定要先研究上层建筑,而不仅仅是研究具体的器物。

比如,解释不好良渚玉琮,理解不了良渚玉琮的设计理念,我们可能就理解不了良渚人,那么我们对良渚时期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组织形态就不了解。比如治水,从来就是治国理政的一种形式。良渚人治水就是良渚人治国。怎样把治水和治国有机地贯通起来,这可能

是我们良渚考古未来要发力的重点方向。



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风光。 图源视觉中国

乌镇戏剧节,满是敢闯的劲儿

——专访乌镇戏剧节发起人、总监制黄磊

■ 本报记者 竺大文 陆遥

初秋,乌镇,再度坠入戏剧时光。乌镇戏剧节,这个诞生于2013年的文化品牌,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“本命年”。从最初“呼朋唤友”仅6部作品的青涩起步,到如今成为汇聚25部中外佳作、吸引全球目光的行业标杆,乌镇戏剧节用12年时光,在江南的氤氲水汽中,长成了世界戏剧版图上一颗耀眼的星。

“似水年华”酒吧,是黄磊经常出现的地方。在20多年前拍摄同名电视剧时,他第一次踏入这个江南水乡,由此结缘。这里的街道、河流和房屋他都再熟悉不过。黄磊曾说过,乌镇是他心中最柔軟的归属。

我们的话题由此漫过戏剧的光影、古镇的肌理,也触及到时光里的那些周期与回响。

高大上的戏剧节,为什么要选在乌镇

记者:相较于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浓厚的文化氛围,最初把戏剧节放在小镇的考量,是否有点冒险?

黄磊:我有一个关于“小镇办大节”的思考。大城市是大窗口,是一片茂密的大森林和大田野,有广阔天地;小镇与众不同,它是一个小窗口,但更能凸显特色。

记者:从小窗口往往能看得更清晰、更集中,更有对比度。

黄磊:是的,项目最开始时,我就希望把它做成这样一扇窗,让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秀美,看到中国与世界的同步;从这个小窗口,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元的文化,及其对艺术的思考和展示。

记者:它会形成一种反差的美,在一个江南小镇里,做一个相对先锋前卫的戏剧节。



黄磊:演员、导演,代表作有电视剧《似水年华》《小欢喜》等。乌镇戏剧节发起人、总监制。

黄磊:我第一年提出在乌镇办戏剧节时,朋友们听岔了,还以为要办戏曲节,问我是唱越剧还是花鼓戏。我说,是戏剧、话剧,是莎士比亚、贝克特!

我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件事,你在这里唱越剧当然没有问题。就好比杭州有越剧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,但如果德国有越剧团,大家会认为这太先锋了!只有在乌镇这里做当代性的东西,它才新鲜。一个江南小镇,在我看来,恰恰能完成这样一种完美的链接。

记者:那什么是乌镇?

黄磊:放在这里有两个原因。

第一,我喜欢乌镇。从导演《似水年华》开始,我对乌镇有了感情,这是最起初的原因。第二,乌镇吸引我的是拥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和非常优质的管理力量。小镇有一个完整的戏剧节系统,自己培养专业人才。这个团队已经训练了十几年,分为戏剧团队和艺术节团队。戏剧节结束后,这些剧场经理又会更换制服,回到办公室继续做旅游、品宣、财务等本职工作。乌镇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细节,上上下下通力合作,才能促成这件事。

记者:在整体规划上,会不会侧重和小镇业态相结合?



第十二届乌镇戏剧节古镇嘉年华演出现场。

主办方供图

黄磊:我特别想强调的是,乌镇戏剧节是一个独立的艺术活动。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去契合业态,不是简单地在旅游点搞驻场演出,出发点不是为了拉游客或者给乌镇打广告。乌镇的萝卜丝饼很好吃,但我们没有做一场关于萝卜丝饼的戏剧。

当然,因为有了乌镇戏剧节,乌镇被赋予了不同意味,它变成了一个戏剧和文化小镇,而非非常规的旅游小镇。

选剧背后,有什么样的审美思考

记者:每年的特邀剧目都是最受关注的。今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《人类之城》了,这是一部要演9个小时的“马拉松式”戏剧?

黄磊:是的,《人类之城》分三天演出,在本届戏剧节期间上演两轮。这部戏源自德国汉堡的德意志剧院,是德国戏剧大师卡琳·拜尔执导的。这部戏的所有情节都来自一个古希腊神话故事——忒拜城的兴建和衰落,包含狄奥尼索斯、拉伊俄斯、俄狄浦斯、伊俄卡

斯忒、安提戈涅等5个故事,也就是说其实有5场戏。

德意志剧院将这部古希腊神话进行了当代语境下的重新解读,他们称之为“人类之城”,但这个城市已经不再单指古希腊的忒拜城。这是一个宏观叙事的过程,它讲述了人类的命运。孟京辉导演在德国看了这个剧,非常震撼,后来我们就一直努力邀请他们来参加乌镇戏剧节。

记者:听说,400多件舞台道具7月就已经从德国海运出发了。

黄磊:的确,这部戏的阵容非常宏大,所以之前从未走出欧洲,甚至没有离开过汉堡。戏里有90余名演员,还有歌队和鼓队。我们委派了两位懂音乐和戏剧的年轻导演,在5月份前往德国,与剧团一起排练演出。学成之后,回来招募了75名中国演员,共同承担了歌队和鼓队部分的演出。

记者:乌镇戏剧节的选剧有着鲜明的特色。像这出戏,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的标准?

黄磊:乌镇戏剧节在特邀剧目上有自己的文化审美——当代的、国际视野的、

具有先锋意味的。本届乌镇戏剧节要在11天里呈现71场演出,内容非常丰富。

记者:除了特邀剧目之外,今年还有什么不一样的玩法?

黄磊:今年我们的“小镇对话”也在升级,包括严肃的演后谈和理论探索。还有明星参与的跨界活动,邀请到音乐家吕思清、建筑大师马岩松等一起参与。

还有我们的嘉年华,戏剧节期间一共有上千场表演,分布在乌镇的各个角落。今年我们还特别提升了夜游神的音乐品质,把戏剧集市和潮流艺术展放进景区内,让年轻人在看戏之外,有多种多样的体验。

记者:我们想,在戏剧节期间来到乌镇的,不仅有戏剧爱好者,也有许多游客,他们可能会更加惊喜。

黄磊:乌镇戏剧节并非一个演出季,而是一个文化平台。我们致力于创造更多元素,同时也是节庆活动——既是艺术家和艺术青年们的节庆,也是广大游客和观众的节庆,欢迎大家来参与。

“本命年”了,戏剧节的齿轮往哪里转

记者:今年是第十二届乌镇戏剧节,用中国人的说法,它走过了一轮,迈入了第一个“本命年”。

黄磊:乌镇戏剧节出生于2013年5月,属蛇,还很年轻。如果它算一个孩子的话,今年刚要上初中,青春期即将来临。青春时代应该更有想象力、更具探索欲。保持童心和初心,才能有青春活力。

记者:目前的乌镇戏剧节,有哪些是出乎你最初预想的?

黄磊:没想到事情太多了,比如我们没想到它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戏剧节之一。前些年,柏林戏剧节主席就坐在你背后这个位置,告诉我说,我认为你们

是世界上最好的戏剧节。可能是客气话,但是能讲这些,肯定是看到了我们的优秀之处。

记者:这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?

黄磊:我回头看好像那是冥冥之中注定的。如果你一定要说它是什么,好像那就是一种命运。是命运,并非运气;也不是我的命运,是乌镇戏剧节的命运。我们的发起人和整个团队与乌镇一起用力、用功,认真地完成这件事情。

记者:戏剧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?

黄磊:应该说,我们关注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这也是我参与的一档综艺节目的名字,节目最近一期就是在乌镇进行的。美好生活包括美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,戏剧也是其中之一。

记者:戏剧需要现场,会产生亲密的接触,在创造美好生活上,这是一种优势吧?

黄磊:戏剧可能更多的是劣势,它毕竟还是相对小众的艺术。我演了20年的话剧《暗恋桃花源》,累计演出800场,如果算每场演出观众有1000人的话,需要20年才能够完成80万人的戏剧普及。而一部电影,轻易可以有几百万几千万人观看。

很多人认为戏剧和自己有距离。不过因为这个距离,它也让人产生了好奇心和神秘感。戏剧如同种子一样,为我们带来特别的收获。

记者:让我们畅想一下,下一个“本命年”,你希望它是什么样子?

黄磊:我认为那时乌镇戏剧节会更加丰富。它那届24岁了,是真正的青年人。它会变得更加独立、强壮、更有志向,也会承担更多的责任,这是我对它的要求。我也会一直陪伴它,希望它36岁的时候我还在,48岁的时候我还在。

记者:乌镇戏剧节在你的生活中占据的比重是多少?

黄磊:此刻,是全部。